

中国人生精神

ZHONGGUO RENSHENG JINGS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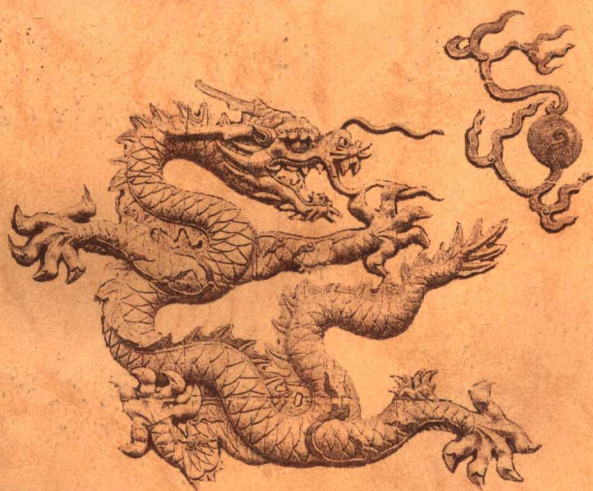
ZHONGGUO RENSHENG JINGSHEN

郑晓江



程林辉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生精神

郑晓江 程林辉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欧薇薇 金虹

责任校对 蒋平生

中国人生精神

郑晓江 程林辉 著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 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发行 广西新华书店

印刷 广西地质印刷厂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13.375

字数 313千字

版次 1998年2月 第1版

印次 1998年2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书号 ISBN 7-219-03639-6/B·102

定价 25.00元

再版序：迈向新世纪的挑战与回应

1997年6月，我与李承贵先生同赴广州参加“全国人生科学学术研讨会”，行前与广西人民出版社温六零副总编辑通一电话，得知温先生将把新出的我与詹世友先生合撰的《西方人生精神》一书直接带到广州，心中欣喜不已。

在羊城的珠江江畔，我手摸皮纹纸软精装的《西方人生精神》一书，心中十分激动，与温副总编实有些相见恨晚，畅谈数日之后，温先生有意将《中国人生理论史鉴》改名为《中国人生精神》再版，我自然十分赞成。

10余年研究岁月的流逝，使我坚信人生问题将是下个世纪人们关心的“热点”与学界中的“显学”，广西人民出版社能倾其巨大的财力与物力出版这两本书，且以异常精美的装帧和纸张来印刷，的确是有气魄、有远见、有慧识的。

在我看来，正迈向现代化的中国人，在人生观与人生模式的问题上，将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进入新世纪呢？这关系到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进入大振兴、大崛起的时代；关系到中国

人能否拥有科学的、合意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与人生模式，以提升生命和生活的方式，获得更幸福更美好的人生。因此，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思索一下人生的诸种问题，实属必要。

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的内涵、过程、方式、意义、目的、价值等的看法，若把这些看法贯之于人的生命过程，运用于生活的实践，就形成了人生的模式。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经济、文化、政治等发生着深刻变革，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等也都在发生重大的调整，这必将导致人生观的剧变，引发人生模式的变化。为了从理性上把握这一变化，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

二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大约经过了80余年，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经军事上的“求强”到经济上的“求富”；从呼吁体制改革的“戊戌变法”到政治革命的“辛亥革命”，再进入一个军阀混战的时期，这些都展示着中国社会由一个比较统一、比较稳定的状态，进入到一个大变化、大动荡的时代，思想观念上的“新旧之争”、“中西体用之争”，经济上新生产方式的影响，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激荡，等等，又使得中国人在观念上进入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从根本上说，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变化无不最终要落在人的生活层面上，无不显现为人生观与人生模式的变化。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爆发了遍及整个知识精英层的“科学人生观”与“玄学人生观”的论战。

这次有关人生观的论战包括三派：以张君勱、梁启超等为代

表的“玄学派”，把人生观视为主观的、情感的、直觉的，人生观无“是非真伪之标准”。所以，“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以丁文江和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科学人生观派，则认为人生观必然要受到“论理学”（即逻辑学）的公例、定义、方法的支配，所以人生观应该也必须上升为科学，而决不可沦为任意性的“玄学”。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的人生观则指出：“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而社会的上层建筑，包括思想观念，无不受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所决定，所以，“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

若透过表面现象，直切事物的本质，便可觉察 20 年代的人生观大讨论中的三派，代表着当时中国思想界中的“俄化”（唯物史观的人生观）思潮、“欧化”（科学人生观）思潮及部分的“传统化”思潮（玄学人生观理论来源一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叔本华的唯一意志论，另一则源于中国宋明时期的陆王心学）。“俄化”思潮经过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造，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培养出了一大批革命者和革命家，经过不屈不挠的人生奋斗，终于在 1949 年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欧化”思潮及人生观则培育出一大批科学救国论者，在知识阶层有着广泛的影响。“传统化”思潮及人生观在中国社会各阶层有一定的影响，“现代新儒学”的出现是其一证，而民间百姓坚持比较保守的传统式生活方式者亦比比皆是。

三种人生观与人生模式互相蕴、激荡，演变为各类人生观及人生实践的方式，从而在中国现代史上牵引出一幕又一幕激动人心的历史及人生事件。

从 20 年代的人生观大讨论到本世纪末，又一个 80 年过去了，这之中经过了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

历史时期，新中国终于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昭示着唯物史观之人生观的胜利。而在40年代末以后，“欧化人生观”因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及功利主义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传统型人生观则因其家族主义、纲常伦理、保守顽固性等被当做“四旧”也受到猛烈冲击。至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在人生观与人生模式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但不久发生的“文革”浩劫，破坏了这种人生观与人生模式的神圣性；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实，以及生活方式多样化的呈现，逐步瓦解了这种人生观及人生模式的统一性。尤其是苏、东巨变，更使这种人生观及人生模式受到普遍的怀疑。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勇气，一切从实际出发，建构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在人生观的方面，主要是剔除原有人生观中的盲目的斗争哲学、政治泛化以及不讲人道等因素，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根本宗旨，结合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为人们建构起了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人生产理想，以团结互助、讲道德、奉公守法、积极进取、爱国主义等为人生准则的人生观与人生模式，这已成为当今中国意识形态、大众传媒及教育系统大力倡导的占主导地位的人生观与人生模式。

但不能不正视的一种现实状况是：“欧化”的人生观挟经济强势再次复苏，在当今中国青年人当中已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可以说，以自我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和以求利求享受为中心的功利主义人生观与人生模式正在迅速地泛化。而传统型的人生观与人生模式在80年代中期之后，亦有复苏的迹象。因为中国古代文明在当今社会愈来愈受到世人的瞩目，也因为当今的人类饱受环境污染之苦、核战争之威胁，尤其是现代人在高度物质化的社会生活中痛感生命无法安顿、人生意义难觅，等等，所以，中国传统型的人生观与人生模式对许多人而言又有了某种存在及践履的价值。

如果说，中国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的约80余年的发展中，人生观由一种主导型向多样型并存转轨；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至世纪末的这80余年的发展中，人生观的演变则是从多样性人生观走向一种人生观，再变而为以—种人生观为主、多种人生观并存的格局。这其中演变的复杂性、曲折性令人目不暇接，其变化之剧烈之迅捷亦使人叹为观止。

因此，是否可以作出如下判断：2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人生观大讨论的背景与基础在20世纪末又将再现？中国第二次人生观大讨论将在21世纪初勃然兴起？实际上，在1980年中国就出现过全国性的由署名潘晓的信引发的关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大讨论；1982年又出现因大学生张华救人牺牲引发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大讨论；中国学术界也在90年代围绕着“人文精神”展开过大讨论，并出现过主体性问题、人道主义、人学研究的热潮，等等，这些都可视为下世纪初将在中国勃兴的人生观大讨论的序幕。

20世纪20年代人生观的大讨论，曾经造就出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史的三种类型的人；而下世纪初的人生观大讨论应该为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中国人寻找到科学且合意的人生观和人生模式，使中华民族以一种崭新的精神风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迎接新世纪全面腾飞的到来。

三

这种近百年才一遇的机会，给中国人生学的研究提供了一大发展的基础与动力，同时也使其面临严峻的挑战。为此，中国人生学研究应该自觉地与一些理论性学科，如哲学、人生哲学等区

分开来，应该也必须把理论的视角放在具体的人生实践之上，多研究些具体人的生活，多给普通人提供切实可行的人生理念和人生实践的方式。也就是说，“人生学”这门学科应该具备实在性和操作性。因为所谓“人生”就不是抽象的，它与每个人的具体生活密不可分；“人生”也必须是具体的，它只能是一个人一个人的现实生活集合而成，最终也只能表现在具体人生的人生操作之中。

因此，人生学的研究应该为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中国人提供“生涯设计”的知识，指导人们根据自我先天的条件，如智商、体能、习性等，以及后天的条件，如所受教育、环境等，来确定自己今后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选择何职业、何领域才最有发展前途，能够最佳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惟有如此，人生学的理论才能使人们获得幸福充实的人生。

人生学还可发展出“人生诊断学”的分支学科，把人生的理论转化为类似于医学的那种诊断及治疗的技术。凡是人们在婚姻、事业、家庭、人际关系、人生选择等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者，凡是人们有悲哀、忧伤、苦闷、烦躁、恐惧、牵肠挂肚、物欲太炽等等的人生不良状况时，都可把其作为一种“人生之病”来诊断、来治疗。现代社会快节奏、求变化的发展方式，以及许多人以利欲满足为核心的人生追求及人生操作，已使人们在生理性、精神性疾病之外，又增添了许许多多的“人生之病”。它既非纯生理性疾病，亦非纯精神性疾病，而是两者的结合体——既是生理性又是精神性，两者完全互渗，无法剖析开来单独地或施以物理性、化学性治疗，或施以精神性、心理性的分析治疗；而只有结合二者，从“人生之病”的大背景去分析、理解和治疗，才有治愈的可能。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人生之病”已呈现为愈演愈烈之势，这就迫切需要人生学发展出“人生诊断学”的学科予以扼制，并给现代中国人带来人生的顺畅与幸福。

中国人生学的大发展，还依赖于倡导与推动人生类型学的研究。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经济成分的多样化，以及香港回归形成的“一国两制”的局面，中国人拥有的人生观与人生实践的方式必然越来越多样化，它表现为人生模式的多种并存。揭示人生模式的类型，探讨其内涵、特色、性质，把握其发展和流变，是人生类型学的基本任务。如果中国人生学的理论要达到倡导健康积极的人生观，引导大众拥有合意且合理的人生实践的方式，就必须承认和直面当今中国人生模式多样化的现实，并深入地研究，区分类型，抽象出特征，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进而加以科学地指导。

总之，中国社会的发展，预示着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又将出现一场人生观大讨论，它将回应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之后产生的人之生命安顿的问题，这将是中国人生学研究百年一遇的大好时机。为此，必须加强人生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把研究的重心从人生的一般性和抽象性转移至人生的个别性和具体性；努力推进人生类型学的研究，最终在新一轮的人生观大讨论过程中，为迈向现代化的中国人建构科学且合意的生死观及人生实践的正确方式。

四

为此，在人生理论上的研究还必须发掘古今中外哲人对人生问题的看法，把这些宝贵的历史思想的资源转化为现代中国人可运用的人生智慧及人生实践的正确方式。我与同事们穷10年之力撰写《中国人生精神》及《西方人生精神》两书，其目的和宗旨也就在此了。

根据我在《西方人生精神》一书中的研究，我认为西方人的

人生观与人生实践的方式一直受到三大思想源头的滋润：一为理性主义的人生观传统；二为非理性主义的人生观传统；三是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人生观传统。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互有消长。它们之间的张力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是人生模式的多极化，显得异常丰富多采，各种类型的人生模式虽然相异，却相安无事；二是人生观的变化性，人们在人生过程中刻意于求变、求新、求发展、求突显个性等等。这一人生观的特征在现代西方社会尤显突出。近现代以后的西方思想家，大多已经意识到并表述出这样一种看法：在人生观与人生实践的方式上无对错之分，只有合意与否、合理与否的差别。所以，容忍不同的人生模式并存，甚至于包容异端和异己成为西方社会提倡的人生观的基本特征。

而我在《中国人生精神》一书的研究中则发现，虽然中国人的人生观及人生实践的方式在先秦时亦有多种源头，如先秦时的儒道墨法，如汉以后的佛道二教的人生思想。但自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多源头便同归于“大海”，虽然仍有所谓“儒释道三教”的说法，但人生理论的总倾向是刻意突显其中的共同性，消解它们的相异性。所以隋唐以后儒释道一体化的过程加快，使中国人在人生模式上难以形成多样并存的局面，这就使人生观之间的张力不够强，丰富性也不够。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的是人生观与人生实践方式上的对错性，而合理与否、合意与否则置于次要的地位。这也说明了一种现象，即：虽然历史上也有许多人追求人生观上的不同，即求新、求异、求变化，但却被社会整体意识指为不正常，需要加以扼制，等等。

当然，在人生模式的问题上，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观念为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人生模式之是非，各种类型的人生模式都有其产生的背景与基础，决不可机械地进行优劣好坏的价值评判。如

果说，西方人生模式的特色有其产生的合理性，那么，传统中国人生模式之特征亦有其出现的必然性。

但问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由于经济成分的多样化，生活方式也多样化了，使人生模式已呈多种并存的状态，所以，这更突出了探寻历史上中华民族不同的人生模式的重要性，以及借鉴西方人之成功的人生模式的迫切性。

我在撰写《中国人生精神》及《西方人生精神》的过程中，不想求体系的完整，亦不刻意于思想家们多方面理论贡献的研究，而以中外哲人在人生观上有否独特建构为标准，探索不同人生模式的渊源、特征、内容、性质。也许有读者会纳闷：怎么某某都没写？但我只能在宝贵的有限的篇幅突显出中外历史上各类人生理论的相异性，惟如此，才可供现代人进行比较、鉴别、选择和汲取，并获取健康、合理且合意的人生观，付诸人生的实践，从而走向人生的辉煌。

这些就是我埋首于生死学研究的初衷，亦是我撰写《中国人生精神》与《西方人生精神》的心愿与目的。

郑晓江 1997年6月18日序于
南昌青山湖畔“神游斋”

序 言

现代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这不仅意味着高科技的引进、先进机器设备的使用，更重要的是它将导致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风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实际上，每个中国人都面临着一个人生观的转换问题。

在中国，人生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另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文革”10年曾使许多中国人比较一致的人生理想和信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的10年，多元的西方人生选择模式骤然展现在人们眼前，许多人要么无所适从，要么完全盲从。现实的迫切需要

给理论提出了重大任务，因此，人生问题必将是未来中国理论研究中的“热点”，但这一问题的解决却有赖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

一是研究中国现实社会，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并引以为根据，设计出既符合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适应现代要求的人生模式。同时，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之成为中国人普遍遵循的人生观。二是研究西方的人生理论。西方人生学说丰富多采，彼此差异甚大，需做深入探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中国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三是研究中国传统的人生理论。我们应该回溯祖国几千年灿烂的文明发展史，清理历史上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寻觅在现代仍有相当影响和借鉴价值的传统人生理论，这也是重建现代中华民族人生观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本此想法，我们撰写了《中国人生理论史鉴》一书，希望通过对中国古代和近代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思想流派和著名文人的人生理论的探讨，来全面系统地梳理发掘中国古近代人生学说的主要内蕴，溯其源、探其流、辨其优、考其失，为现代中国人创立新的人生观寻求某些积极的历史价值，同时揭示其中的消极因素，以为现代人之鉴。

二

我们用19章、30余万字的篇幅，从中国先秦诸子的人生理论一直写到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人生学说，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如果读者有兴趣翻阅一下，便可发现，中国古代贤哲对人生问题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他们对人生的奥秘和真谛进行了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探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人生理论资源。

如果从纵向的视角考察中国人生理论的历史，可区分出三个

相互紧密联系又有各自鲜明特色的阶段。

第一，先秦时期，这是中国古代人生理论的创立、形成阶段。这时期，相继出现了孔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思想家的人生理论。这是一个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的时期，使中国人生理论在“源头”上就呈现出空前繁荣、多姿多采的特点。实际上，中国古代人生学说的基本理论框架、主要范畴概念，以及逻辑结构、理论特色都是在该时期确立的。先秦时期的人生理论是中国古近代人生理论发展的源泉活水。

第二，两汉至明清时期，这是中国人生理论发展、完善到僵化的阶段。这时期的主线是儒家人生理论逐渐从先秦百家中的“一家”上升为“独尊”，其倡导的人生观弥漫于中国思想界并转化为中国普通民众人生实践的具体方式。此外，还有佛、道二教的人生理论和魏晋人的人生理论的异军突起。所以，这时期的人生理论虽然在丰富程度上比先秦稍嫌单调，但并非像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是儒学的一统天下。

两汉至明清时期中国人生理论的发展出现了“溪水分流”的现象：一部分思想家继续致力于中国人生理论的思想探索活动，不断丰富、发展、充实先秦时期的人生理论；更多的政治家、文人学者则致力于实践先秦的人生理论，并在实践过程中融合了各种不同的人生学说。当然，这种区分是相对的，从事理论探索的思想家同时也在进行人生实践，致力人生践履的政治家、文人学者也为中国人生理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根据这样一种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我们除在理论上着重分析了董仲舒、《列子》、魏晋人和佛、道教的人生理论外，还从理论和人生实践两方面描述了李白和杜甫、苏轼、王阳明和王学左派以及清初实学家的思想和行为，希望用这种方式为读者勾勒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人生理论轮廓。至于宋代朱熹的人生理论，则是儒家人生学说的登峰造

极之作。正因为如此，儒家的人生理论日趋坚硬，缺乏弹性，难以容纳现实生活发展的新变化，从此走向式微。实际上，王阳明和王学左派，以及清初实学家的人生理论已对朱熹为代表的儒家正统人生观提出了挑战和批评。同时，伴随着历史车轮的向前飞奔，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已可以眺望新的人生理论诞生的曙光了。

第三，清代至民国初年，这是中国人生理论的转换和革命时期。一批封建社会的改良者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者，面对内忧外患、灾祸频仍、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现实，为了推进社会变革，他们借鉴了西方某些思想家的人生理论，对中国传统人生学说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并最终完成了中国古代人生理论的近代转型，创立了既有中国传统人生理论特色，又有近代色彩的人生理论体系。限于篇幅，我们在这一阶段只安排了两章，一写康有为、谭嗣同的人生理论，一写孙中山的人生理论。章节虽少，内容却十分充实，从人生理论的丰富程度看，丝毫不亚于先秦时期。

三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中国人生理论的横向面剖析，可以发现，中国古近代的人生理论与精神几乎涉及了所有重大的人生课题，且有众多的精粹之论。步入中国人生理论的天地中，我们恍若行进在“山阴道中”，只见花木葱茏、山川映发、云蒸霞蔚、俊彩星驰，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细加玩味，中国古近代人生理论触及到如下重大的人生问题：

第一，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问题。中国古代贤哲从哲学本体论上对人是什么？人何以为人？人与自然及动物的区别是什么等

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他们主要通过“人性”这个范畴对人的本质展开讨论。在先秦有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之争；汉代有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宋儒朱熹则提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思想家们从对人本质的不同理解出发，演绎出差异甚大的人生理论体系。

人的价值问题实质上就是人生存意义所在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有把个人价值置于社会价值之上，以个人的物欲满足为唯一享乐追求的纵欲主义，如《列子》。但这种人生价值论并非主流，更多的思想家则强调人价值实现的社会性，把社会责任、社会义务、历史使命置于个人价值之上，这一点在先秦的孔、孟、荀，唐代的杜甫，宋代的苏轼、朱熹以及清初实学家那里都有详细的论述。

第二，人生理想和完美人格的问题。人生理想是人们为之奋斗努力以求实现的人生境界；完美人格则是人们为自己树立的人生榜样和人格准则。一般来说，人生理想和完美人格是每个人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人生抱负和人生追求的导航坐标，它为人们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生动力，并使人察觉到人生是充实的。在中国古代人生理论中，有把为天下兴利除害作为人生理想的墨子；有把成贤成圣作为完美人格的儒家学派；有把清静淡泊、自然无为作为人生追求的道家学者；有把进入虚静空无的涅槃境界作为人生目标的佛教；也有把实现天下为公、去苦求乐、文明进化的“大同世界”作为人生理想的康有为和谭嗣同；还有把提倡民主、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作为终身为之奋斗的人生理想的孙中山……

第三，人生准则和人生态度。人生准则是人们为人处世的基本规范，人生态度是人们对生活、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在中国古代人生理论中，究竟以什么作为人生准则，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